

持续发掘海上丝绸之路文化 全方位发挥海洋文化软实力

——关于研究开发广东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调研报告

黄伟宗

最近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加快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发格局”的要求（下称“中央决定要求”），对笔者启发很大，促使笔者回顾了从1992年被聘任为省政府参事至今20年来，在省政府参事室党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偕同一批来自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省作协的多学科专家学者，在进行珠江文化研究的同时，研究开发海上丝绸之路的进程，从而进一步体会到中央的决定和要求具有深厚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具有高瞻远瞩的发展战略意义，特提供调研报告和建议如下。

一、研究开发海上丝绸之路的起因、进程及成果

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笔者即开始探索珠江文化和海洋文化，起因是受当时西方现代文化学进入中国的影响，更直接的是出于一部电视片的触发。这部电视片的主题，是探究中国受封建制度和思想束缚而造成长期落后的原因，影片的回答：是在于作为民族文化发祥地和中心的黄河文化属黄土地文化，而不是海洋文化；而西方发达国家都是因以海洋文化为主体的。对此，笔者当即质疑：难道中国只有黄河文化吗？难道中国没有海洋文化吗？于是，便有意地从广府文化进入探讨珠江文化，从海上丝绸之路进入探讨海洋文化。当然，这两条研究线路是交叉结合进行的，但也大致各成系列。

古代丝绸之路，是指汉代到鸦片战争两千多年来，中国与周边及世界相关国家地区之间，进行商贸和文化交流的交通线路，由于中国特产以丝绸著名，18世纪德国学者李希霍芬在其中国旅行记中，正式使用“丝绸之路”一词，被普遍接受而通行至今。历来说法中国丝绸之路是从西汉张骞通西域开始，始发地是长安（今西安）。20世纪50年代，学术界开始有海上丝绸之路的说法，具体始于何时、何地则众说不一。1990年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专家到中国考察海上丝绸之路古港，确定福建泉州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依据是在泉州发现南宋时的海岸沉船，以及来自中东的教主遗墓碑和回教移民村。故泉州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资兴建的“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而广东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考察时未受专家注目，于是留下了广东究竟有无（或有怎样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存的悬念。正是带着这个悬念，开启了笔者与一些学者研究开发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和海洋文化的进程。这个20年进程，大致可分为六个阶段，具体如下。

（一）从田野考察对西汉徐闻古港的实证，到举办“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南方港”研讨会的确认

早在 1993 年夏天，笔者受聘为省政府参事不久，即偕同文教组参事到古广信所在地封开和梧州，考察广府文化和珠江文化，当时得知《汉书·地理志》有一段记载：称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即派黄门译长从广信到徐闻、合浦赴日南（今越南）出海外多围。这是中国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字记载，但是从未有学者到徐闻、合浦实证这个记载。

2000 年 6 月上旬，正当珠江文化研究会成立之际，笔者等一行冒着酷暑，到达徐闻县西南沿海土旺村（与徐闻古县治“讨网”音近），在二桥、仕尾一带，发现汉代板瓦、筒瓦、戳印纹陶片，以及汉墓、枯井口、烽火台等遗存，综合之前考古学者在此发现的汉代“万岁”瓦当、水晶珠、银饰、陶罐等文物，以及《汉书·地理志》中有：“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开航”、“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南西北方千里”等记载，将田野考察实证与史料记载结合判断，这即是西汉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旧址。笔者随即写出参事建议《应当重视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发》，受到省领导的高度重视，批准成立以黄伟宗为首的“广东省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开发项目组”（下称“项目组”），继续进行论证并扩大沿海古港的考察研究工作，这是正式探索进程的起步。这项实证成果，意味着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考察团在泉州确定的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在南宋始发时间，推前到西汉，从而具有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史推前 1300 年的意义。

由此，项目组从两方面进行深化研究开发工作：一方面是继续开展对合浦等南海古港的田野考察工作，包括到泉州古港学习取经；另一方面是进行文案研究并撰写作品及编写论著工作，于 2001 年 11 月出版了《珠江文化丛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专辑》6 部，包括《开海》（洪三泰等著）、《千年国门》（谭元亨等著）、《广府海韵》（谭元亨著）、《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诗选》（陈永正编注）、《交融与辉映——中国学者论海上丝绸之路》（黄鹤等编）、《东方的发现——外国学者谈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徐肖南等编译），共达 200 万字，由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这套专辑，既将原有考察研究上升到更高的学术档次，又为研讨会提供了充分的学术准备和基础。

2001 年 11 月下旬，项目组在湛江市举办“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南方港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广西、海南、福建、香港、澳门等地百余位专家们，再次证实和认同了我们对西汉徐闻古港的发现和实证，充分肯定中国本是世界海洋大国之一，应当改写将中国排除在世界海洋大国之外的世界文化史。

（二）从对南海沿岸古港的普查，到《海上丝路文化新里程》等重要专著的出版

自研讨会结束后，项目组乘胜前进，继续坚持走田野考察与文案研究并著述相结合的学术道路。从 2001 年至 2003 年期间，项目组同仁先后到南海沿岸的南岸、柘林、凤岭、樟林、白沙、大星尖、广州、香港、澳门、广海、阳江、电白、雷州、徐闻、合浦、北海、钦州、防城等古港，以及西江、北江、东江、南江、漠阳江、鉴江、南流江、北流江等港口，进行实地考察，发现每个古港都有一段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历史，而且在历史上呈现

此盛彼衰的现象，但在总体上形成了从汉代至清代都不间断地有繁荣古港的形势和格局。由此说明，广东自古以来都有不间断的海上丝绸之路历史，在每个历史年代都有兴旺的古港和历史，是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最长、最完整的文化大省。

这些研究开发成果，都集中体现在 2003 年出版的专著《海上丝路新里程——珠江文化工程十年巡礼》中；同年出版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黄启臣主编）、《珠江文化论》（黄伟宗著）、《珠江文化与史地研究》（司徒尚纪著）等专著，更将田野考察成果上升到深度的理论学术层次。

（三）从发现海陆丝绸之路对接通道，到《珠江文化丛书·十家文谭》出版

项目组一直以田野考察的方式，持续进行古代文化遗存的发掘，并且一直坚持以多学科、多方面、多层次综合考察为方针，因而不断有新的发现和新成果，被称为“填补丝绸之路学术研究空白”的“海陆丝绸之路对接通道”的发现，即属此例。在此之前，学术界对陆上丝绸之路研究早已硕果累累，近年起步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也正风生水起，但都是各自为政地研究，既不注意将两者研究联系进行，又忽视在文化遗存中尚有许多起到对接两者的古道文化，所以造成了这个学术空白。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上半期，笔者在先后考察贯通古广信（封开）的潇贺古道，以及南雄梅关珠玑巷时，已对此有所觉察，但真正意识其重大意义的是 21 世纪初对这两条古道的再次考察。这两条古道的遗址和史料，都证实其本身从来就具有对接海陆丝绸之路的功能和意义。前者在《汉书·地理志》已写明，汉武帝派黄门译长开创海上丝绸之路，就是从水陆联运的潇水至贺江古道到广信，然后又沿南江、北流江、南流江到达徐闻而出海的，这不就是名正言顺的海陆丝绸之路对接通道么？南雄梅关古道是由唐代贤相张九龄主持开通。他在《开凿大庾岭路序》中写明其目的，是为沟通中原与海外的贸易和往来。与梅关相连的珠玑古巷，是唐宋以来中原南下移民岭南以至海外的中转站，致世界广府人皆认其为“吾家故乡”，可见梅关珠玑巷在历史上起到对接海陆丝绸之路的重大作用。此外，我们还发现了南雄乌迳古道、乳源西京古道、连州南天门古道等等，可见广东古道文化丰富。古道具有对接海陆丝绸之路的重大作用，亦理当属于海陆丝路文化遗存。

这些古道发现是这个阶段的主要成果。每项发现，笔者都及时写出调研报告通过《省政府参事建议》呈报。项目组在这个阶段的学术成果汇集于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 2006 年 1 月出版的《珠江文化丛书·十家文谭》中，包括：《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开发》（周义编）、《海上丝路与广东古港》（黄启臣著）、《珠江文化系论》（黄伟宗著）等书，共达 300 万字。

（四）从“海上敦煌在阳江”题词，到举办首届南海 1 号与海上丝绸之路论坛

阳江南海 1 号宋代沉船，从发现、出水到进入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安放，历时十年有余，从始至终都是世界性的新闻大事，因为这条沉船，是迄今世界海上出水历史文物中，历史最早、体积最大、文物最多、保存最好、价值最大的文化遗存。由于其是从事中外贸

易的商运货船，具有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性质；而且其文物以瓷器为主，代表了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陶瓷之路”的特点；尤其是以往发现的海上丝路文化遗存多是海岸文物，海中实物甚少。所以，项目组2003年9月对其考察时，笔者为其作了“海上敦煌在阳江”的题词。从此，南海1号有了“海上敦煌”的文化定位和代号。笔者作此定位的根据是：陆上丝绸之路文化遗存最多的是甘肃敦煌，约有6万余件，故为陆上丝绸之路的文物中心和文化标志；而阳江南海1号沉船中的文物，估计有6万到8万件之多，又是具有海上出水文物的“五最”优势，堪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物中心和文化标志，故称“海上敦煌”。

万没料到，这个文化定位和代号也震动了世界。当时《阳江日报》报道南海1号是“海上敦煌”的文化定位，并在网上传播，被正在中山大学举办世界文化遗产申请培训班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知道了，便托人找笔者引领，于2004年元旦前往阳江考察。当他们认真观看南海1号少量出水文物和听取介绍之后，当即做出“世界少有”的表示，并认同“海上敦煌”的定位。2004年5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成功大学原校长吴京教授知悉，打电话到中大，希望前往考察南海1号，经上级部门批准后，笔者陪他到阳江考察。结果他对南海1号评价更高，认为“世界海洋史要由此改写”；接着他在中山大学对研究生做报告时又讲到，南海1号与郑和下西洋都是中国宝贵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2007年12月22日，南海1号沉船打捞出水，进入广东海上丝绸之路馆“水晶宫”安放，笔者应邀参加了庆典，150多家海内外媒体记者云集采访，发表了大量报道，又与《阳江日报》总编辑薛桂荣汇集全部报道于《海上丝路的辉煌》一书中，并于2009年6月出版。2011年4月26日，在阳江举办了首届南海1号与海上丝绸之路论坛，来自北京、陕西、甘肃、上海、福建、湖北、广西和本省等地近百专家学者，充分论证、高度评价了南海1号的“海上敦煌”价值和意义。不久，笔者与谭忠健主编的论文集《海上敦煌在阳江》，由中国评论出版社于2011年12月出版。

（五）从在广州发掘“西来初地”“十三行”，到在台山发现“广侨文化”“侨墟楼”

早在20世纪90年代，广州有“四地”之称，即千年海上丝路发祥地、岭南文化中心地、民主革命策源地、改革开放前沿地。其实，这“四地”都是因具有江海一体的文化特质而来，皆因海洋文化而来。由此，广州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历史特长、文化遗存特多，最著名又有代表性的是“西来初地”与“十三行”。前者是东晋时印度佛教禅宗和尚达摩从海上丝绸之路到达广州的登岸地，达摩是中国禅宗始祖，其登岸地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也是“海上传教之路”。后者是清代最大的商帮——粤帮的统称，又是清代从乾隆至同治年间全国唯一对外通商并具海关职能的口岸，历时三百余年，直至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才结束。“十三行”实则是清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心和标志，很有历史文化意义。笔者和项目组多位同仁，都为发掘其文化遗存写过多次调研报告和参事建议以及历史报告文学、电视剧本等作品。

海外华人华侨和侨乡文化，实质上也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一种产物和体现，因为出海或回归、联络、交流，都必经海上丝绸之路，所以海上丝绸之路也是华侨之路。项目组自2006年以来，一直关注华侨和侨乡文化现象，多次到江门、开平、台山、恩平、鹤山、新会、蓬江、东莞等地考察，先后发现和提出“后珠矶巷”“客侨文化”等文化现象和文化定位，受到海内外媒体的普遍关注。尤其是从2006年至2011年，项目组到台山进行多次调研，发现和提出了“广侨文化”和“侨墟楼”文化现象，更具有典型代表意义。“广侨文化”是广府文化与华侨文化融合而成的一种新型文化；“侨墟楼”是侨乡中墟集商市总称，因其既是传统农村墟集，但又因是华侨投资所建而有“楼”，并有与海外通商的码头和商行，而具有“洋”的特点，是“广侨文化”载体之一。它具有自“十三行”统管海外通商结束后，所出现的中国海外通商在侨乡遍地开花的转型意义，也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在侨乡泛化之体现。所以，广东大多侨乡都有这种“侨墟楼”，但以台山为最多、最集中、保存最好。2012年8月项目组举办了中国首届广侨文化研讨会，来自北京、武汉、广州和江门以及澳大利亚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充分论证和肯定了这种文化遗存具有独特的海洋文化和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价值和意义。笔者和邝俊杰主编的《广侨文化论》是这项成果之集萃。

（六）从《中国珠江文化史》完成，到《中国南海海洋文化研究丛书》出版

2009年6月28日，正当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成立10周年之际，本会（也即是项目组）同仁历时三年努力而完成的300万字大型史著《中国珠江文化史》，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继《黄河文化史》、《长江文化史》出版之后，被学术界称为“填补中国大江大河文化史空白”的史书。这部史书的完成，既是珠江文化工程带总结性的阶段成果，也是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的阶段性的总结成果。因为它以大量的史料和翔实的论证，以数千年珠江文化发展历程和体系，证实了珠江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发源地之一，是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等并列而构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家族中的一员，同时也论证了珠江文化本身就江海一体的特质，而具有特强的海洋性：这部史书中又有大量篇幅，系统论证了与珠江流域一体的南海沿岸海上丝绸之路的悠久历史和发展，从而以雄辩的史论匡正了中国无海洋文化的偏误。

虽然取得了这些重大成果，但项目组并不以此停步不前，而是乘胜前进，向海洋文化进军。所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同志致信表扬《中国珠江文化史》的时候，笔者在复信表示感谢的同时，提出了为研究海洋文化立项的请求。在汪洋同志的关心和支持下，从2010年开始，项目组在原有珠江文化和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进入海洋文化的深度研究。2013年7月，出版了由笔者主编并撰写长篇引论的《中国南海文化研究丛书》，内含《中国南海海洋文化论》（谭元亨等著）、《中国南海海洋文化史》（司徒尚纪著）、《中国南海海洋文化传》（戴胜德著）、《中国南海古人类文化考》（张

镇洪等著)、《中国南海商贸文化志》(潘义勇著)、《中国南海民俗风情文化辨》(蒋明智著)等6部,共达200万字,由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属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二、从中央决定要求看海上丝路研究开发的若干要点

1. 海上丝绸之路,是汉代以来中国通向世界的千年海洋航道,既是交通航道,又是经济、贸易、文化往来的通道。它首先并主要是经济往来的功能,同时又具有政治、文化、外交、军事等诸多方面意义,尤其是具有国际之间人民友好交往的意义;它开始并主要是中国与沿海周边国家地区的海上通道,随着航海能力与经济实力的增强,逐步延伸至太平洋及其他海洋诸国或地区。可见千年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与国际之间进行经济和全面合作的纽带,又是人民友好往来和友谊的象征。所以,前些时候习近平总书记出访欧洲和亚洲时,先后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央决定要求以“推进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发格局”,是很有历史依据和发展战略眼光的。

2. 海上丝绸之路的实质是海洋文化,千年海上丝路之历史证实,中国是海洋大国。西方学者之所以否认中国无海洋文化,其根本在于海洋观的不同,更在于海洋文化的本质差异。从中国千年海上丝路史可见,西汉黄门译长是为找特产而出印度洋,宋代南海1号是运瓷货出洋,明朝郑和不带一兵一卒七下西洋,清代“十三行”是经商出洋,历代华侨是谋生下南洋,全都不是像西方殖民主义者那样为霸占殖民地而在海洋上兴风作浪。可见,中国千年海上丝路史是和平友谊的海洋史。所以,中央决定要求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具有承传发展我国和平友谊的海洋文化传统和海洋观,并以此为和平外交政策与睦邻友好基石的重大意义。

3. 中央决定要求“推进”当今“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也应当以此精神“推进”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开发,并将古今对接起来。因为“观今宜鉴古,不古不成今”,将古观好,才能更促成今,建好今。

4. 为此,要持续研究开发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并以中央决定要求“全方位”研究开发丝绸之路文化。即:不仅是从经济上而且还要从政治、军事、文化、外交、国际交流上研究;不仅是分别研究海上或陆上的丝绸之路,而且要将两者联系起来并对两者的对接通道进行研究开发,以形成“全方位”研究开发的格局。

5. 广东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应持续发挥“率先”的“排头兵”作用。广东是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最长、港口最多、航线最广的大省,是接受海洋文化最直接、最丰富、最充分的大省,是毗邻沿海各国及地区的经济大省、海洋大省、文化大省,理当在贯彻落实中央决定要求的使命中,持续发挥“率先”的“排头兵”作用。

三、关于以文化软实力之“五力”，全方位发挥海洋文化软实力的建议

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既是海洋文化软实力之载体，又是海洋文化软实力之迸发体。2007年党的十七大引进的文化软实力理论，完全适用于对古今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建设与开发。笔者曾据文化软实力的理论核心，将其力源细化为文化激活力、文化对应力、文化伸张力、文化浸润力、文化持续力等“五力”。现以此理念提出全面发挥海洋文化软实力的建议。

1.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实际上是以文化对应力的原理，利用历史上与中国有经济往来的国家地区，因有海上丝绸之路的友谊之“缘”，而以此“缘”之亲和力为纽带，建立亲密的合作关系。这项“再续前缘”的举措，就是文化对应力的运用和发挥。由此，就应当自觉地以此理念主导，持续深挖并千方百计地发展原有亲和力之纽带，使相互合作关系全方位地发展。据历史资料，古代海上丝路经过交往的国家和地区有五十多个，现已知近百个。可以通过外交途径，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海上丝路文化遗存及其所在地再结“前缘”，全方位合作，借联合国已决定将世界所有丝绸之路文化遗产评为一项遗产之时机，共同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提高其文化价值和知名度，扩展增强文化对应力。

2. “再续前缘”和深挖“前缘”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要以文化激活力再生“前缘”，也即是以新的理念和举措，使已逝去的历史文化元素重新具有新的生命力和感动力，这就是既有再生“前缘”的激活力，又有对当今受众的激活力。由此，应当自觉的以此理念，采取种种方式，激活并发挥“前缘”之感动力，如着力扶持海上丝绸之路题材的电视片、电视剧、歌舞剧、美术作品等文艺创作。据笔者所知，现在已有不少这类题材作品，如：辛磊的长篇小说《大清商埠》、谭元亨的《十三行》电视剧本、丘树宏的《海上丝路》组诗、谢鼎铭的《海上丝路》组画等，都是比较成熟的作品，应当大力扶持。成功的文艺作品，既是对历史题材的激活，又是对读者观众心灵的激活，运用于海上丝路，功力无限。

3. 对于我国或相关国家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题材、作品、成果、活动，应当以文化伸张力的理念和文化功力，以种种方式和媒介，扩大其能量和影响力。如以印发邮票、印花税票、礼品，举办会展、发布微博、微信、网络新闻、网络通信等，使其“前缘”复苏，并持续而层出不穷地发挥出更大能量和影响力。建议在阳江海陵岛，以南海1号存放的广东海上丝路博物馆为中心，将整个岛建设为永不落幕的海上丝路博览园，一方面是以深圳世界之窗的模式，将全国和世界各地的海上丝路文化遗存或景点，以袖珍的形象聚现园中；另一方面是以广交会模式，为有海上丝路文化之缘的国家地区提供场地，让其自建有本国海上丝路文化风格的展馆，展销其特产与民俗风情文化产品。如能建成，必将有持续发挥海上丝路文化伸张力的效果。

4. 文化浸润力，就是环境力、氛围力、孵化力。应当以此原理营造丝绸之路的建设环境、海洋文化氛围，浸润人的海洋文化素质，孵化海洋文化人才、文化产品及企业创新。建议在广州这个海洋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地方，加大突出海上丝路文化与海洋文化

特色，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具中国南方特色的海洋文化大都市。由此，在软件和硬件建设两方面，都应当以海洋和海上丝路文化为主线，无论在古建筑的维护改造，还是新建筑的建设，从媒体宣传到街道或高大建筑风格设计和命名，都应强化海洋和海上丝路文化的基调和色彩。例如，被媒体俗称“小蛮腰”的广州塔，应当恢复当年网上全球 18 万人次投票评选出的“海心塔”之名；已建成的“西塔”和正在建造的“东塔”，两个名字都浅薄一般且欠“海味”，建议加冠“比目”而名之，即可称“比目西塔”和“比目东塔”，这样，既以一种海鱼之名而显“海味”，又有广州“双眼”之寓意。以海洋文化眼光营造的环境，才有海洋文化浸润力，才真正具有海上丝路的“全方位的开发格局”。

5. 文化持续力，就是文化转型力、转化力、综合力，具体用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就是要“古为今用”、“洋中通用”、“五力并用”。因为以“前缘”而建新的经济带、新丝绸之路，无“古”则失“缘”，不为“今用”则缺“新”；中国与海外他国共建新“路”，不能没有中国特色，也需尊重相关国家地区的文化特色；中央决定要求“形成全方位开发格局”，就是要全面发挥文化软实力之“五力并用”，这就必须有权威机构的综合统筹，设立领导小组或指挥部，确立相应决策和实施机制，才能堪此重任。同时，应当在学术上持续对古代海上丝路文化，并连接扩大对新丝绸之路海洋文化研究，才能切实保证和发挥文化持续力。

(2013 年 9 月 2 日)

作者：黄伟宗，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作家。